

近代史事論叢
第二冊



著湘相吳 ②二八之書叢學文記傳

近代史事論叢

第二集



鄭士甯繪「武列行圖」，騎馬者為清乾隆帝與香妃。

禁二次革命可辦
通緝黃已格再緝
是失行也似不妥
然擇副之

自
案

第二集目錄

海外新見中國現代史史料·····	二三一
三韓扶桑所見袁世凱關係史料·····	二五三
「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前言·····	二八七
「中國近代財政經濟」前言·····	二九五
梁啓超徐志摩論蘇俄·····	三〇三
林則徐對俄認識及其影響·····	三一三
清內務府檔案中的乾隆帝衣飾·····	三三七
香妃考實證補·····	三四七
清宮檔案中所見曹雪芹先世事蹟·····	三五七
西洋音樂東傳記略·····	三八一
第一部中文西洋樂理書·····	三九一

朝鮮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	三九五
清世祖實錄三種不同的節本·····	四三三
乙未辛亥間的革命戰役·····	四四一

海外新見中國現代史史料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一日，相湘應邀自臺北飛美國加州洛杉磯，出席「蘇聯與亞洲人關係會議」(Soviet-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會後遊歷美國及歐洲中東各城市，分訪各大學及圖書館，先後近七閱月，獲見若干有關我國現代史的新史料。爲供同好參考，特擇要陳述於左，但爲節省篇幅，所舉述者只限於手寫抄本及若干原始資料。

一 手寫抄本 口述歷史

在美國西岸東岸各大學圖書館中，有若干關於我國現代史史料的手寫抄本，例如 Pomona College 圖書館中收藏的政治討論會會議錄二十三冊，是研究民國初年政治的材料。史丹福大學

胡佛研究所圖書館收藏的參戰實錄寫本是記載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始末，鄭垂日記抄本是鄭孝胥兒子記述他父子倆隨溥儀被日本軍人挾持出關的情形，這些都是很有趣的重要史料。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是以專門搜集度藏戰爭、和平、革命的資料著名於世，其中如有關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東路事件、中共匪黨等資料照片，已經學人引用研究出版專書。該館近年收購中國現代史料尤不遺餘力，抗戰時若干稀見的土紙印刷小冊亦多入藏。但引人注意的是美國著名親共記者史諾(Edgar Snow)夫人 Nym Wales (Helen F. Snow) 贈與的「遠東資料收藏」。其中均史諾夫婦抗戰前及戰時在我國各地旅行搜集的資料，甚多原始文件，如毛澤東致史諾請其「代為宣播」演講詞的若干手札等。史諾太太並將有些資料加以整理註釋，如民國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中國學生運動的註釋(註一)，都是就其夫婦以外國新聞記者身份的便利，與各方接觸後的見聞而作的進一步說明。

由於官員或民間領袖身份，有在中國廣泛接觸的便利，而獲得資料的美國人，將他們的收藏捐贈胡佛圖書館的尚有多人，如曾任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分署署長史幹克(Dr. H. G. Schenck)就曾將他在華日記贈與該館，但約定它須俟其故世後二十年才可供公開閱覽。

哥倫比亞大學近十年來，新創一口述歷史計劃(Oral History Project)。是一九四八年該校歷史系教授 Allan Nevins 首先倡導的。主要的是利用當事人的口述和其有關文件及一有史學素

養與訪問人物經驗的助手相互配合而記錄歷史事實。這一計劃最初推行的一年即一九四八—一九五〇年只訪問記錄二十一人，以後逐年增加，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訪問對象增至一百四十九人。今已爲史學方法開一新方向。一九五八年，中國旅美人士胡適、顧維鈞、陳立夫、孔祥熙、李宗仁等均被邀約訪問，這對於中國現代史顯然會提供新資料。

相湘在美時，承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韋慕庭教授 (Professor C. Martin Wilbur) 的安排，得到參觀陳立夫等人口述歷史的實情，並且也調閱哥大特藏室內度藏的口述歷史紀錄的已公開的部份，其中有前美國駐華大使詹森 (Nelson T. Johnson) 的口述歷史，共計三卷，七百三十頁 (打字)。詹森當辛亥年武昌起義時在漢口美領館服務，直至民國七年。其後又調任其他城市，故其了解中國政治社會情況至深，其所陳述亦坦誠。例如他說：民國十二年 (一九二三年) 二月，他以美國務院特派觀察員身份由上海乘船赴香港，上船後發現孫逸仙先生與陳友仁亦同舟共濟。陳友仁曾再三與其交談，陳申言如著有聲望的美國人士如許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能來中國，將各地軍閥約聚一堂，坦白交換意見，當可在各軍閥之間建立一和平解決的途徑。詹森在「口述歷史」中回憶這段事實後說：我在這船上，從未與孫逸仙先生見面會談，我知道中國人早就試圖使美國人出面幫助中國走出難關。「促使我們出面，幫助他們走出難關，爾後他們又走向俄國——但我當時未如此想。」詹森又指出：我在和陳友仁談話時指出：陳的想法是一嚴重觀

念，因想促使各軍閥和平解決，必須使用力量，這一力量實即美國力量；但此舉將使許士無法回美。蓋美國從不願干預中國之事，設有如此事發生，將無一人支持許士。

按是時孫先生甫於是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和平統一宣言，並為中俄關係與越飛聯合宣言，美國官員的反應如此，是可以注意的。

如果口述歷史計劃繼續擴大，許多不見諸書面記載的事實和解釋，當可於此途徑尋得答案。因之，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同好，不僅應該注意這一計劃，並且應該應用這種方法於國內，為許多關係人物作口述歷史，保存直接史料。

哥倫比亞大學另一有關現代中國研究，即「中國現代人物與政治研究計劃」(Research Project on Men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這一計劃由包華德氏(Howard L. Boorman)主持，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之下進行已將五年，今後將再繼續三年，工作目標在編纂一包含六百人的現代中國人物的傳略(1912—1949)，體例略如一九四二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刊行恆慕義氏(Arthur W. 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兩者時代是相連的，但前者工作的艱鉅顯非後者可以比擬，因清代人物傳記刊行已多，一檢房兆楹杜聯誥夫婦合編之清代三十三種傳記引得，即可收控制資料之功，而辛亥以來人物傳記極少刊行，即野史亦難得，加以政治局勢變化多端，若干人士言行反覆無常，矛盾百出，

各種宣傳品中之說法尤光怪陸離，搜集難，抉擇批判尤不易。但就相湘在這一計劃辦公室月餘的流連，發現他們工作認真，盡一切可能接觸的線索向世界各地去訪尋資料或有關人士，一方面編製資料目錄，一方面就已可控制的資料撰寫初稿，分送各方請求審閱。現已寫成的文稿，至少已經三四次改訂（註二）（筆者曾閱讀其各類文稿）。很顯然地，以如此求真的態度，在將來全書完成時，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貢獻，當可想見（註三）。

由於美國各大學各學術機關非常熱烈地致力研究中國現代史，風氣所被，旅美中國人士或被邀參加研究，或自動整理家藏資料，前者如張嘉璈、顧孟餘等，後者如黃郛（膺白）夫人沈亦雲女士等。尤以黃沈亦雲女士二十餘年來，歷經國難，始終護持膺白先生文稿及若干關係人士手翰，今旅居紐約，復發願本其見聞以整理是項可珍貴史料。七月下旬，相湘在其寓所，親見若干文件，如民國十三年馮玉祥致膺白先生主張「親日」之手札等，均可使吾人了解甚多事件之演變，並彌補國史上若干空隙。相湘曾建議黃夫人攝影保存，並供同好，承其慨允並付諸實行了。

二 美國攝製日本檔卷

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的中文藏書，是中國以外度藏中國書刊最豐富的所在，其中有關現代史的如民國初年刊行的個人文集，即為他處所少見。特別是對日戰爭勝利後，接收日本東亞研究

所的藏書資料，更增加其現代中國史料收藏的質量，其中如民國九、十年間蘇俄最早刊行的華文宣傳品，若干赴俄學生抱朴（秦蔭清）等對蘇俄實況記載，和民國十六、七年間莫斯科油印的中文演詞及檢討報告，若干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等反對俄共的著作等，都是稀見的。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該館東方部度藏的日本外務省和軍部檔案的膠片。

日本外務省檔案膠片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與國務院協同在日本攝製的，自一九四九年四月開始，歷時近三年，計共攝製膠片二千一百十六捲（每捲一百呎），將數近二百萬頁（相當於每冊五百頁之書籍五千冊），三千六百餘組的文件均包括在內。內計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年）、大正（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六年）年份八百〇四捲，昭和（一九二六—）年間七百二十二捲，專題研究一百八十五捲，電報檔案一百六十四捲，國際戰犯法庭文卷九十四捲等（註四）。

自一八七一年中日建立外交關係以來，由於地理位置的接近與日本軍閥侵華的傳統政策，中國事情的各方面幾乎都是日本所注意的，因之，在上述的檔卷中，不僅有中日外交事務往來的記述，更有數逾五十類左右關係中國內部的記載，例如：

- 一、中國革命（一九一一—二）。
- 二、民國歷史（一九一七—四二年，每兩年一冊）。
- 三、袁世凱稱帝計劃（一九一五—六年）。

四、內戰歷史（一九一三—一九三六年）。

五、中國經濟情況（一九〇五—一九四一年）。

六、外國在華經濟開發計劃（一九二四—一九三九年，內含英、法、俄、日諸國及日美經濟合作）。

七、對華文化合作計劃等。

八、西安事變。

這些文件的記述，有些可能是國內記載所不見的。至於中蘇關係、共黨活動、共匪叛亂等更有極多專卷按年編次，其中如早期活動，越飛來華訪日，日本共黨活動（內含一九二六年至三八年臺灣共黨活動），中東路事件與戰役，日蘇會議、協定、條約等等對於中國現況的了解都提供許多原始資料與日本方面見解。至於日本與各國關係，特別是九一八以來對我國的侵略，這些檔案所透露的事實，對於中國現代史學者們，顯然都是新鮮而可貴的。

上述檔案膠片是在東京攝製的，底片現存美國國會圖書館，我國學術機關及圖書館宜早購置複印，以供學者研究。

除開這一外務省檔卷以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另有日本海軍省、陸軍省及其他政府機關檔卷膠片。這些原始檔案是一九四五年對日戰爭勝利，盟軍佔領日本時運往華盛頓保存的，對日和約簽訂後，日本要求歸還。美國國會圖書館乃約請專家學者擇其中重要的攝製膠片，我國楊覺勇

(John Young) 實主其事，計共得二百二十九卷，分成一五五六條主題，其中大部份是有關中國的。例如中國革命民國成立時期，日本外務省即有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各地使領電報二十八冊（攝製成膠片八捲）。在長江流域的日本第三艦隊的電報數目亦大概相當。華北第二艦隊的電文也有數冊，並有日本海軍臺灣站的有關電報。陸軍省及參謀總長的命令報告數量亦甚可觀。至於陸海軍省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支那事變」（中國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蘇關係、中蘇關係、中共叛亂以及蘇俄情報活動等等，尤爲這一檔卷中的重要主題，中國軍政人物黨派等等也佔甚多篇幅（註五）。

以中日關係之密切，有這數達二千五百捲的檔案膠片行世，對於中國現代史研究上提供甚多事實的新證據，不待煩言，可以說這是中國現代史研究者所必須加工努力開發的一大寶藏。

美國國家檔案局內的外交文件，一九三二年以前部份已經開放。由於美國對遠東與中國的立場和英日迥異，其觀點見解，可說明某一事件的另一面。我國留美學人唐德剛博士在此檔案局流連年餘，在若干事實上，他發現和美國學者根據引用英國檔案所敷陳，顯有甚大差異。這是值得吾人注意的。

三 國父倫敦蒙難檔案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相湘由紐約飛抵倫敦，此行主要目的在求獲得閱讀英國外交檔案中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

英國現與中華民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但事實上對我國學術界人士還保持友好態度，當相湘的要求提出以後，英國外交部次官即正式覆函，申稱承外相勞艾德(Mr. Secretary Lloyd)之命接受相湘的申請，就是允許我到國家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去調閱有關的外交部檔卷。

基於英國政府的規定，五十年以前的檔案均可供公眾閱讀研究。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開始於一八九五年孫逸仙先生領導的廣州之役，在這一革命行動不幸失敗以後，香港政府發佈不准孫先生在香港居留的禁令。從此，中國革命運動就開始在英國官文書中有記載。翌年，孫先生在倫敦蒙難事件發生，更震驚英國朝野。我按照這一時限，也就是說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九年間的檔案目錄中去找尋，很容易地就發現 F. O. 17. 類第一七一八號是「英國領土內之中國革命黨」(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British Dominions)，並有子題如下：

Sun Yat-sen, Kang Yu-Wei

(Kidnapping of Sun Yat-sen by Chinese Legation)

(1896—1905)

除開這一專案檔卷，其他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多分見於一九〇六年以至一九〇九年政治類

中國部門中。

在這許多文件中，最令人感到興趣的當然就是上述這一專案檔卷中有關孫先生倫敦蒙難的物件。

按有關孫先生倫敦蒙難之事件，民國十六年，羅家倫曾據我駐英使館、清總理衙門檔案與若干英方文件及當時私人記述寫成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中央黨史史料編纂會近刊「國父年譜初稿」於此多從其說。英文方面數種著述，其中出版時間較後之一種康德黎爵士傳（Sir James Cantlie by Neil Cantlie and George Seaver. London 1939），亦刊行於英外部此項檔卷可以公開閱覽之前。因之，可以說現今行世的各種文字書籍中正式引用此項檔卷以記述這一事件的，尙屬罕見，其可珍貴也就不待煩言了。

孫先生蒙難消息傳出後，英外部之所以採取干涉態度，在清使館非法使用管轄權違反孫本人意旨而加以誘拐。清使館所持以辯護的理由則謂，孫在被幽禁之先一日曾到過使館，即被禁之當日亦彼個人自動前來者。這一論調的形之文字，首見於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清使館參贊馬格里致倫敦泰晤士報投函中，其後包齊馬格里傳（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by D. C. Boulger）採錄此函，吳宗濂的「隨軺筆記」著意描述被禁先一日孫與使館學生宋芝田的談話，用意正復相同：企圖脫卸誘拐責任。

但現在上述英外部這一專案檔卷有很多原始文件，例如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英外部印刷文件二十一件，係據內務部就此事件調查全貌而編成，分送有關方面參考之機密文件，今與各有關原始文件均存此檔卷中，其中第一附件即討論孫是否曾先一日至清使館一問題，因為這是此一事件是非的主要關鍵所在。英內務部司法部人員因馬格里堅持孫曾先一日至使館的論調，孫先生則矢口否認，其他人證又均予支持，故詳細調查審問各有關人證，雖以未能至清使館調查為憾（事實上曾與清使館主謀之馬格里談話）。但綜合詳勘反覆推敲各種可能後的結論，證明孫的說法是真實的（Having found Sun truthful on material points）。就是說，孫先生在被禁前一日未曾到過清使館，他完全是被誘拐入內的。這一專案題名開宗明義即著明「Kidnapping」，可說是正名覈實。

孫蒙難後之能獲釋，消息外洩於康德黎是一重要關鍵。據上述檔卷中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孫尚未獲釋）康德黎在高等法庭（High Court of Justice）證詞：十月十五日，康遇孫所居留之葛蘭旅店之波奈爾女士（Miss Pollard）言：孫自十一日來，四日未回旅店不知去向，即已關切之至；至十七日夜，康家信箱內忽有一未署名信言其中國友人被禁清使館，康乃報警。

這一寄發未署名信予康氏者為何人？不僅為一有興趣問題，並且是重要關鍵所在。孫先生自撰「倫敦蒙難記」謂為使館英僕柯爾之妻，今黨史會刊行之國父年譜（上冊第七三、七四頁）考